

*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
Ideological Trends in Society*

山东省社会科学「八五」规划重点研究课题

戚其章 著

中国近代社会
思潮史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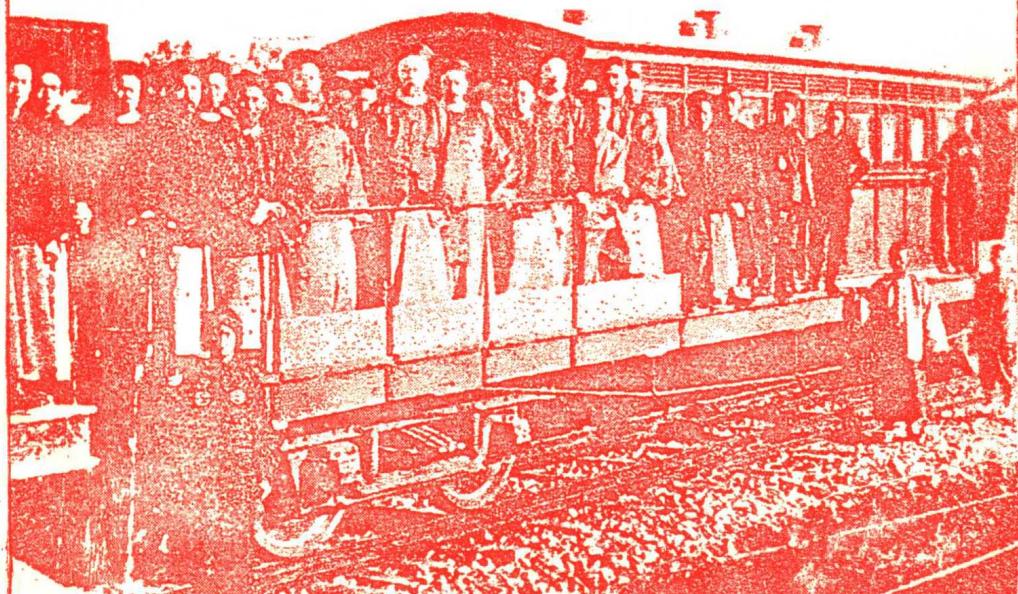
Shan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Qi Qizhang

— 规划重点研究课题 —

中国近代社会 思潮史

戚其章 著



鲁新登字2号

山东省社会科学“八五”规划重点研究课题

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

戚其章 著

◆

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◆

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5插页 335千字
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

ISBN 7—5328—1945—0

K·52 定价：10.60元



戚其章 1925年3月生于山东威海。1948年夏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。现任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，中国史学会理事、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。出版有《北洋舰队》、《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》、《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》、《甲午战争史》等专著4部，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《中日战争》及《齐鲁百年风云录》、《中国近代爱国丛书》等，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。获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和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。



前　　言

近代社会思潮(或简称近代思潮)问题,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。近代思潮的发展必然要极大地影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;只有对近代思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,才能够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有深刻的了解和切实的把握。因此,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,这个课题都无疑有着重要的探讨价值。

什么是近代社会思潮?对于近代社会思潮的理解,不能望文生义,不能认为凡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的思潮就是近代社会思潮。本书所论述的近代社会思潮是一个特定的概念,指的是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或性质的思潮。

中国社会的近代思潮并不是突然发生的。应该看到,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,已经出现了近代思潮的萌芽,它就是清初以来迄于鸦片战争前夕的经世思潮。但经世思潮并不等于近代思潮,因为它本身始终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思潮。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,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下,经世思潮才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早期形态——海防思潮。海防思潮不仅在当时有重大的影响,而且对尔后近代思潮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可以说,不了解海防思潮,就无法从整体上触摸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发展的脉络。

近代思潮的依次演进,既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,又

反映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。在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以前，中国先后出现了四种近代思潮，它们是海防思潮、洋务思潮、维新变法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。这四种近代思潮就是本书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。

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是一个庞大的课题，也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。本书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。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我深感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进行研究。书中呈献给读者的就有若干个人探索而得来之刍见，然不敢自是，粗疏之处定所难免，还是请读者去评判吧。

这本《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》是山东省社会科学“八五”规划重点研究课题，在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了有关领导和许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，当此书始告杀青之际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著者

1993年9月28日于泉城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章 中国近代思潮的早期形态——海防思潮	1
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	1
一 西力东渐	1
二 禁海与开海贸易	10
三 制定防范外夷章程	16
四 从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看清朝的闭关政策	28
五 鸦片贸易与英舰叩关	36
第二节 海防运动的肇始与林则徐	46
一 林则徐的经世思想	46
二 近代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	58
三 林则徐的海防思想	77
第三节 海防思潮的兴起	92
一 林则徐海防思想的总结之作——魏源《筹海篇》	92
二 魏源《海国图志》的增补及其主要内容	102
三 海防思潮激荡下掀起的研究“海国”热潮	115
第二章 洋务思潮的勃兴和发展	140
第一节 来自不同营垒的近代化方案	140
一 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发展	140
二 人间“小天堂”的蓝图——《天朝田亩制度》	160
三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化方案——洪仁玕《资政新篇》	176

四 “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的近代化方案——冯桂芬《校邠庐抗议》	188
第二节 洋务思潮的勃兴	198
一 千古变局与洋务思潮的发生	198
二 洋务思潮的两大口号——“自强”和“求富”	214
三 洋务思潮的本末观	232
第三节 洋务思潮发展中的一波三折	242
一 洋务派与封建顽固派的思想分歧	242
二 设天文算学馆引起的辩论	247
三 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	261
四 修筑铁路的风波	277
第三章 维新变法思潮的发展及其理论基础	299
第一节 洋务思潮向维新思潮的过渡	299
一 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	299
二 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	325
第二节 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发展	331
一 早期的大同思想——《人类公理》	331
二 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——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	339
三 理想与现实——维新变法纲领的调整	350
第三节 维新变法思潮的重要理论著作	366
一 鼓吹维新变法的力作——梁启超《变法通议》	366
二 《天演论》与严复的维新变法理论	376
三 谭嗣同的激进维新变法思想	392
第四节 维新变法思潮与“中体西用”论	409
第四章 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和高涨	422
一 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	422

第二节 民主革命思想的理论体系——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	444
一 民族主义与“反满”和反帝	444
二 民权主义与资产阶级共和国	454
三 民生主义与“平均地权”	465

第一章 中国近代思潮的早期形态 ——海防思潮

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

一 西力东渐

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，虽然很早就产生了近代思潮的萌芽，但始终未能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思潮。中国产生近代思潮，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渐以后的事。

西力东渐，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。早在 14 和 15 世纪，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各城市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。其后，在法国南部、英国东南部地区以及莱茵河畔的一些城市，资本主义因素也相继滋生。15 世纪 90 年代，美洲的发现，绕过非洲的航行，更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广阔的新的活动场所。到 16 世纪，在西欧，资本主义终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。资本主义浪潮在西欧一角涌起后，愈来愈猛烈地向各大洲冲击，逐渐把世界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许许多多古老的国家和民族，难以逃脱被冲击的命运，或早或迟地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漩涡中去。

资本主义浪潮对中国的冲击，从 16 世纪初就开始了。最初来中国的是葡萄牙殖民者。1514 年（明正德九年），葡萄牙军官

阿尔瓦列斯(Jorge Alveres)首次航行到广东屯门,进行窥探。其后,葡萄牙马六甲总督达尔伯克喀(Jorge d' Alboquerque)又连续两次派商船来华,均获厚利而归。欧洲人因受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的影响,视中国为遍地黄金的神秘之邦,早就做着到中国来发财致富的美梦。达尔伯克喀两次派人来华,皆获大利,更觉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所述已得到证实。于是,决定派咿瑠·安拉德(Fernao Perez d' Andrade)率船八艘来华,以“贡方物”为名,试图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。1517年(正德十二年)夏,葡萄牙船队直驶广州怀远驿。药剂师皮来资(Thomas Pirez)冒充马六甲贡使,奉旨获准带通事火者亚三入京,而安拉德仍留住怀远驿,“筑室立寨为久居计”。翌年,其弟西蒙·安拉德(Simao d' Andrade)奉命前来接替其位,公然“大造火铳,为攻战具,杀人抢船,势其猖獗”。^① 其“所到之处,硝磺刃铁,子女玉帛,公然搬运;沿海乡村,被其杀掠,莫敢谁何!”^② 1520年(正德十五年),御史邱道隆奏请责令葡萄牙还马六甲疆土,方许朝贡。御史何鳌奏称:“佛郎机^③最凶狡,兵械较诸蕃独精。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,炮声殷地。留驿者违制交通,入都者桀骜争长。今听其往来贸易,势必争斗杀伤。南方之祸,殆无纪极。”建议:“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,禁私通,严守御,庶一方获安。”^④

1521年(正德十六年),明朝政府将火者亚三处死,皮来资押往广州监禁,并下令驱逐盘踞广东屯门的葡萄牙殖民者。广东海道副使汪𬭎奉命率兵进攻。葡萄牙殖民者负隅顽抗,依仗精利

① 陈文辅:《汪公遗爱祠记》。见陈伯陶:《东莞县志》卷之三,《前事略》。

② 史澄:《广州府志》卷一二二。

③ 佛郎机,为 Frank 或 Frangi(波斯文)的音译,此指葡萄牙。

④ 夏燮:《中西纪事》卷一,第3~4页。

火炮，猛轰明军。汪𬭎见硬攻难以取胜，便决定对屯门采取长期围困的方法，并开始觅匠试造西方新式火炮。当时葡军所用之西式火炮，以铜铸管，大者千余斤，中者五百余斤、百斤左右。其炮弹内用铁，外用铅。火药制法亦与中国异。一举犯，“木石犯之皆碎”^①，威力甚大。汪𬭎所得到的两种西式火器：一种是火铳，“小如二十斤以下，远可六百步者，则用之墩台”；一种“大如七十斤以上者，远可五六里者，则用之城堡”。^② 皆称精利。明军的战斗力亦因之得到加强。经过几个月的长期围困，葡军粮尽弹乏，难以支撑。于是，汪𬭎看准时机，对葡军发动火攻。“时南风急甚，𬭎命刷贼敝舟，多载枯柴燥荻，灌以脂膏，因风纵火，火及敌舟，适被焚溺，众鼓而登，遂大胜之。”^③ 明军收复屯门。是年10月，葡萄牙殖民军狼狈逃回马六甲。

葡萄牙国王垂涎屯门之地，复命米尔丁·甫思多灭儿(Martin Alfonso de Mell Coulinho)及别都卢(Pedro Hamen)等率船四艘东航，要求与中国缔结条约，允许葡人在屯门长期驻守。1522年(明嘉靖元年)7月，葡萄牙船队驶近屯门，受到中国巡船阻击。于是，米尔丁决定诉诸武力，与先前自屯门逃回之残余力量合伙，并命别都卢率船五艘向新会之西草湾进犯。明军备倭指挥柯荣率部抗击，“众兵齐进，生擒别都卢、疏世利等四十二人，斩首三十五级，俘被掠男妇十人，获其二舟。”^④ 遭到这次痛击后，葡萄牙殖民者一时为之退缩，不敢前往屯门驻足。

明军收复屯门和西草湾之捷，是中国军民抗击欧洲殖民者

① 严从简：《殊域周咨录》卷九，《佛郎机》。

②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一九，载汪𬭎疏。

③ 陈文辅：《汪公遗爱祠记》。

④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二四，第8页。

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。同时，在战斗的过程中，汪𬭎开始试造葡军新式火炮，又开了中国仿造西式火炮的先例。

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既未得逞，除留一部分住澳门西南的浪白澳外，余皆转向闽、浙沿海一带活动。福建漳州的月港、泉州的浯屿和浙江宁波的双屿，成为他们进行走私贸易的活跃地区。葡萄牙殖民者还在双屿营建据点，设立行政机构，企图永久占领。他们一面大规模地进行走私活动，一面公开抢劫。“货尽将去之时，每每肆行劫掠”^①，已习以为常。尤有甚者，还与倭寇、海盗相勾结，掠卖人口，祸害平民，“年甚一年，日甚一日，沿海荼毒，不可胜言”。^②1546年（嘉靖二十五年），倭寇与葡萄牙殖民者相呼应，进犯宁波、台州，“攻掠诸郡邑无算，官民廨舍焚毁至数百千区”。^③翌年，葡萄牙殖民者又同海盗合伙，大举劫掠闽海。明廷为之震动，钦命都御史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，巡抚浙江。朱纨抵任后，整军备，严纪律，命诸将“各分汛地，或战或守，皆有专责，而以福建都指挥卢镗谙海上事，即以委之”。1548年（嘉靖二十七年）4月，朱纨命卢镗向双屿发起攻击。“贼初坚壁不动。迨夜，风雨昏黑，海雾迷目，贼乃逸巢而出，官兵奋勇夹攻，大胜之。俘斩溺死者数百人。”于是，“二十年盗贼渊薮之区，至是始空矣。”^④

双屿既克，葡萄牙人从双屿逃出者南窜福建，企图继续盘踞泉州浯屿和漳州月港二地。朱纨移师南下，他们又窜往诏安走马溪。1549年4月，卢镗与福建按察司、巡视海道副使柯乔协同作

① 俞大猷：《正气堂集》卷七，《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书》。

② 朱纨《甓余杂集》卷三，《海洋贼船出没事》。

③ 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五五，《沿海倭乱》。

④ 胡宗宪：《筹海图编》卷五，《浙江倭变记》。

战，先“出兵埋伏夷贼所泊山顶”，然后率兵船直攻走马溪，葡萄牙殖民者持铳上山，见有伏兵，复退回船上。明军乘机进攻，“一船先登，众船蚁附，彼有大铳，不及灼火，犷弩不及发机，死者胥溺，生者就擒。”^①此战共杀敌 33 名，俘虏 206 人。“贼夷去者远遁，而留者无遗；死者落水，而生者就缚。全闽海防，千里肃清。”^②

双屿之战和走马溪之战两次胜利，沉重地打击了葡萄牙殖民者，使闽浙沿海长达二十余年的灾祸一时肃清。不久，朱纨却被劾“擅专刑戮”，诏令逮京治罪，下卢镗和柯齐狱。朱纨闻讯，叹曰：“去外国盗易，去中国盗难；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，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！”^③遂仰药死。自朱纨冤死后，“佛郎机遂纵横海上，无所忌。”^④

葡萄牙殖民者从闽海被驱后，全部退据浪白澳。1553 年（嘉靖三十二年），以中国复驰海禁，遂“托言舟触风涛缝裂，水湿贡物，愿借地晾晒”。^⑤并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，得以年租五百两白银租住澳门。此后，便不断扩展地方，“筑室建城，雄踞海畔，若一国然。”^⑥

西班牙殖民者也早就想寻找通向中国的航路。1492 年（弘治五年），哥伦布（Columbus）奉命横渡大西洋时，即携有西班牙国王致契丹大可汗（中国皇帝）的国书。但直到 83 年以后，西班牙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。1571 年（隆庆五年），西班牙占领

① 俞大猷：《正气堂集》卷五，《议王直不可招》。

② 朱纨：《甓余杂集》卷五，《六报闽海捷音事》。

③ 《明史》卷二〇五，《朱纨传》。

④ 同上书，卷三二五，《外国传·佛郎机》。

⑤ 郭斐：《广东通志》卷六九。

⑥ 《明史》卷三二五，《外国传·佛郎机》。

了菲律宾。四年后，即 1575(万历三年)，便派传教士拉德(Martin de Rada)和马丁(Geronimo Martin)冒用吕宋的名义来华谋求通商。拉德到达福建，受到中国官员的接待，但未获得通商的权利，1598 年(万历二十六年)9 月，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又派萨摩第(Juan de Zamudio)来华。萨摩第先到澳门，请求“开贡”。司道以其违例，令其离境。10 月，萨摩第移泊虎跳门，结屋群居，妄图长期占据。^① 翌年 10 月，广东海道副使章邦翰遣兵焚其聚居点，始将其驱逐出境。西班牙殖民者并不甘心失败，于 1626 年(天启六年)派兵在台湾基隆登陆，筑城而守。1629 年(明崇祯二年)，复占据淡水，又筑一城。后来败于荷兰，才被迫撤出台湾。

荷兰是继葡萄牙、西班牙之后第三个来中国的欧洲殖民者。1601 年(万历二十九年)，荷兰殖民者以战舰进攻马尼拉受挫，转而直薄澳门。因见澳门有备，未敢冒然进攻。“澳中人數詰問，言欲通貢市，不敢為寇。当事難之。稅使李道，即召其酋入城，游處一月，不敢聞于朝，召遣還。澳中人慮其登陸，謹防衛，始引去。”^② 荷兰殖民者在澳门请市未成后，并不甘心。1604 年(万历三十二年)8 月，由水师提督韦麻郎(Wijbrand Van Waerwijck)率舰队驶抵澎湖，见岛上汛兵撤防，便占领了该岛。福建巡抚徐学聚上书，“请勿轻纵，贻闽海祸”。^③ 总兵施德政派都司沈有容前往晓谕，令其撤离。韦麻郎因接济断绝，乃于 10 月间退走。

1622 年(天启二年)，荷印总督库恩(Jan Pieterszoon Coen)命水师提督雷约佐(Kornelis Rayerszoon)率舰 15 艘再次进攻

① 郝玉麟：《广东通志》卷五八，《外番》。

② 《明史》卷三二二，《外国传·和兰》。按：当时广东税使为李凤，李道当系李凤之误记。

③ 陈寿祺：《福建通史》卷一二九。

澳门，企图由这里打开中国的大门。库恩下达命令说：“为了取得对华贸易，我们有必要借上帝的帮助占据澳门，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，如广州或漳州，建立一个堡垒，在那里保持一个驻地，以便在中国沿海不断地保存一支充足的舰队。”^① 但荷军进攻澳门受挫，转而东窜，于 6 月 29 日在澎湖马公登陆。荷兰殖民者既再度占据澎湖，“名为求市，大肆焚劫”，并“乘汛出没，掳掠商船，焚毁民庐，杀人如麻”。于是，“洋贩不通，海运梗塞，漳、泉诸郡已坐困矣。”^② 参加此役的荷兰船长庞德古 (Willem Bonteqoe) 直言不讳地供认荷军追杀中国居民的情景：“那种可怕的啼哭声和嚎叫声真像世界末日来临似的。……我们挡住了他们，用刀砍他们的头，用火炮射倒一些人。他们又急急忙忙地逃回去……我们把他们全部杀死在那里。”^③ 除野蛮屠杀外，荷兰殖民者还拘获当地渔民从事苦役，夺渔船六百余，拘渔民 1500 人，“筑城妈宫，役死者千三百人”。^④ 不仅如此，还掠夺人口从事奴隶贸易，一次将捉虏的 1150 名澎湖人装往巴达维亚，多数“因疾病、饥饿及强制劳动而死”，到达时“生存者仅有三十三名而已”。^⑤

荷兰殖民者自盘踞澎湖后，不断骚扰漳州、泉州沿海一带，当地商船“内不敢出，外不敢归”^⑥，民生为之凋敝。1623 年（天启三年），南居益抵福建巡抚任，决定募兵买船，渡海进剿。翌年，南居益先派守备王梦熊率明军一支突入镇海港，以都司顾思忠为

① 转引李金明：《明代海外贸易史》，第 197～198 页。

② 《兵部题澎湖捷功残稿》，《明清史料》乙编，第 7 本；《澎湖信地仍归版图残件》，《明清史料》戊编，第 1 本。

③ 萧致治等：《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》，第 69～70 页。

④ 连横：《台湾通史》卷一，《开辟记》。

⑤ 荷印总督卡宾特 (Pieter de Carpentier) 报告。转见《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》，第 70 页。

⑥ 《明熹宗实录》卷三七，天启三年八月丁亥。

后继，自率舟师直抵娘妈宫前。8月16日，明军“直攻夷城，改兵分三路齐进，而夷恐甚”。^① 荷兰殖民军头目松克(Maarten Sonck)竖白旗，乞缓进师，答应拆城还地。26日，荷军被迫撤离澎湖。此役历时近半载，终将荷兰殖民者从澎湖驱走。松克在失败后承认：“我们在中国沿海使用的手段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剧烈地反对我们，把我们看成杀人犯、侵略者和强盗。我们使用来对付中国人的办法的确是残酷无情的。依我的看法，这样做永远也无法和中国建立贸易。”^②

但是，荷兰殖民者撤离澎湖后，并未真正远去。1624年(天启四年)，他们又在台湾登陆，修筑城堡，名曰“热兰遮”(即安平)。松克自任长官。其后，他亲自到新港社，仅用15匹棉布就换取了大片土地，复建赤嵌市街。并使用各种办法继续扩大占领区。1641年(崇祯十四年)，荷军驱逐了基隆、淡水的西班牙人，控制了台湾北部沿海。于是，荷兰殖民者统治所及，有45个部落，193个社，全岛被分成七个行政区。^③ 直到1662年(清康熙元年)2月1日，荷军在郑成功部队的进攻下，签订投降条约十八款，才结束了其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。

英国与葡、西、荷三国相比，它来华的时间要晚得多了。虽然如此，英国积极寻找通往中国的航道的时间却比较早。1573年(明万历元年)，英国人布尔(William Bourne)出版《论海上霸权》一书，提出从英国到中国可能有五条航道。1583年(万历十一年)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决定派商人纽伯里(John Newberry)前往东方，并携带致中国皇帝的国书。纽伯里因到达印度后被葡

① 沈国元：《两朝从信录》卷二三，第39～40页。

② 转引李金明：《明代海外贸易史》，第199页。

③ 陈碧笙：《台湾地方史》，第60～61页。